**红杏何以污名化，探究宋代的红杏意象转型**

**2023313409房效民**

在唐代更多被吟咏外形，被寄予美好春天与青春少女形象的红杏的污名化，应该更多关注宋时文人相比前代在思想上的变化。儒学的复兴，与理学的兴盛，对当时文人的思想性格塑造产生了深远影响，进而影响了对于咏物诗的创作。其影响体现在：追求人格修养的完善对生活的态度。宋代文人不像唐人那样张扬、奔放，更加倾向理智和稳健，追求”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。对人格修养的执着追 求： “ 宋人相比前人更加“砺名节，尚廉耻，严乎义利之辨，讲求雅俗之分” 对于身边所植树木花草，不仅追求其物色欣赏，更在其中体现了胸襟情怀，即“其所种者德也” 。这在咏物诗上有深刻体现，而这一时期“比德”思想的兴起更是促使了文人对于红杏的思想情感的转变。姚宽在《西溪丛语》一书中对杏花的评论最具代表性，他说“予长兄伯 声尝得三十客牡丹为贵客，梅为清客，兰为幽客， 桃为夭客，杏为艳客，莲为溪客……”可见当时杏花 给人的感觉是妖艳的。诚然，宋代也有一些关于红杏的赞美诗，比如宋祁的“红杏枝头春意闹”。而且杏花地位在唐代也有一些走低，比如唐人薛能就有《杏花》一诗：“活色生香第一流，手中移 得近青楼。谁知艳性终相负，乱向春风笑不休。”这里薛 能说杏花生性风流，怎么也改不了倚门卖笑的德性。我承认宋代也有一些赞美红杏的诗作，但是统计数量远不及对红杏有贬义的诗作。同样在唐时，有关杏花诗更多的思想还是作为早春，科举中榜的代表。